

who & what

新聞事件

2010年，深圳迎來而立之年。這座年輕的城市憑著銳意進取的精神當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創新和速度，都是深圳特區的「金字招牌」。在新的出發點上，深圳如何超越過去，為步入深水區的中國改革再尋新路，備受關注。

對話主角

中國第一代改革智囊人物 徐景安

入選理由

作為中國改革的第一代智囊，年屆古稀的徐景安不僅仍然活躍於為中國改革辯護，而且每每有驚人語。對於深圳如何再出發的時代難題，他認為「幸福深圳」才是各方能夠接受的最大共識，也是深圳新改革的最佳切入點。

深圳經濟特區建立30周年紀念園。



中國第一代改革智囊

徐景安：深圳再出發 須舉幸福旗

商報記者 杜潔茵

問題有共識 改革無進展

發展中的問題要靠發展來解決，可是越發展問題越嚴重。這是因為沒有解決如何發展、為誰發展的問題。

香港商報：深圳經濟特區建立30週年之際，人們無不為深圳取得的成就歡欣鼓舞，但也有一些人士擔心隨著內地經濟騰飛，深圳對全國的示範效應會弱化。您對此怎麼看？

徐景安：在中國改革開放的30年中，深圳實現了兩個最快：一個是最快的城市化速度，從一個不知名的小漁村變成1400萬人的大都市；另一個是最快的工業化速度，深圳人均GDP已達1.36萬美元。深圳完成了歷史賦予它的使命。

這30年，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在這場偉大的轉折中深圳提出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這是價值理念的創新，從而帶來了一系列走在全國前面的制度創新，例如土地改革、住宅改革、股份制、證券市場、產權轉讓、社會保險制度改革等等。開拓創新，是深圳作為「特區」的真正價值和意義。

不過，隨著改革開放在全中國的推進，深圳的特區經驗、特區速度和特區效應逐步弱化。有些人士對此提出批評，與其說是對深圳現狀的擔憂，不如說是對深圳未來的期待。

香港商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上月到深圳視察時提到深圳站在「一個新的偉大的歷史起點」，令外界充滿聯想，對此您怎麼看？

徐景安：改革開放進行了30年，許多學者、主流輿論都認為目前最困難、最重要的就是推進行政改革。但怎麼改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我覺得，改革的基本前提就是達成共識。以行政改革作為切入點既沒有認知上的共識，更沒有可操作的方案，看不到前景。對今天中國存在的問題，大體是有共識的，貧富拉大、腐敗氾濫、生態破壞、道德下降，關鍵是找到改革的切入點。

香港商報：深圳每年也都有新的改革舉措出爐，換句話說，深圳從未停止過改革的步伐；與此同時，民間自下而上的改革訴求也很強烈。這兩種不同方向的訴求應該怎麼形成合力？

徐景安：深圳向中央爭取了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也出台了改革方案與改革舉措。但要求繼續推進改革的呼聲一直很強烈，兩種不同方向的改革訴求雖然目標一致，但問題就在於，政府關心的話語和老百姓關心的話語是否一致？

香港商報：您認為這種不一致是怎麼產生的？

徐景安：改革開放30年，「資源有限條件下財富最大化」成為核心價值理念。當時，國困民窮，發展第一，成為上下共識，帶來中國的快速發展。政府是發展成果的最大得益者，而民眾沒有分享發展的應有成果，這就產生了分歧。政府熱衷於發展，而民眾關心的是民生。當年的改革共識已喪失。

香港商報：民生問題的解決，也要靠發展。難道發展第一有錯嗎？

徐景安：發展中的問題要靠發展來解決，可是越發展問題越嚴重。這是因為沒有解決如何發展、為誰發展的問題。具體來說，發展第一帶來三大關係的惡化。一是人與自然關係惡化，突出表現為資源短缺、環境破壞。二是人與人關係惡化，突出表現在貧富拉大。三是人與自我關係惡化，突出表現在精神障礙嚴重、自殺率超高。中國每年有28.7萬人死於自殺，成為世界上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深圳每年有2000人自殺……

不能繼續走速度深圳的老路

香港商報：面對這種狀況，深圳能有什麼作為？

徐景安：首先要有認知上的覺悟。中國需要一次新的偉大轉折，即從物本位轉向人本位，不能再以GDP為目標。汪洋同志說得很明確，發展經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深圳提出2015年實現人均GDP翻兩番，這依然走的是「速度深圳」的老路。深圳應該有新的選擇。

香港商報：考核政府政績的是GDP，有其他目標能替代嗎？

徐景安：當今中國GDP總量已是世界第二，最缺的不是GDP，而是民眾的幸福感和滿意度。群體衝突、校園血案、連環跳樓、滅門慘案之類的極端事件頻繁發生，這就是警訊。

香港商報：那麼，您認為深圳的新選擇是什麼？

徐景安：中國需要新的理念革命，就是從追求「財富最大化」轉變為「幸福最大化」，從而推動制度創新和改革。深圳過去的成功，是順應了當時中國轉折的要求，即從政治為本位轉向物質為本位。今天的中國面臨從物本位向人本位的新轉折，深圳需要提出新的價值口號，引領深圳從主要追求經濟快速發展轉向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的全面發展。

香港商報：您說啟動一輪新的改革必須找到一個可以在社會各層面達成共識的切入點。每個人對幸福的理解都不一樣，能把「幸福最大化」作為目標嗎？

徐景安：作為改革的新共識，一定要與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理念一致。東方紅的歌詞：「呼而嗨哟，他為人民謀幸福」。溫家寶說：「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所以，「幸福最大化」是共產黨的立黨宗旨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本義。這也能為老百姓所接受，誰不希望幸福？

當年，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就是要發展生產力，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在意識形態上佔據了制高點，誰也不能反對。這就成為推動改革開放的出發點。今天要啟動新一輪改革，也必須找到神聖、正義、無可反對的理由，這就是一心一意為民眾謀幸福。

每個人對幸福的理解不一樣，這就是幸福的魅力。每個人的秉賦、興趣、條件不同，可以追求適合自己的幸福。而當今社會，把金錢、財富作為唯一價值目標，逼著每一個人去追求，這就出了大問題，為了賺錢不擇手段，必然帶來各種問題，最後人並不幸福。

香港商報：經濟增長和民眾幸福並不矛盾，為什麼要用一個理念取代另一個理念呢？

徐景安：以發展為第一、GDP為目標，既不重視經濟增長方式的合理，也忽視發展成果分配的公平，就帶來民眾的幸福。而以幸福為目標帶動發展，就決定了增長方式要有利於民眾幸福；解決了為誰發展，發展成果的分配要有利於民眾幸福。以發展帶動幸福，民眾並不幸福，這就是非科學發展，不

幸福深圳：新改革切入點

以民眾幸福為目標，就會改變政府行為。首先，改變了評價目標，以民眾幸福代替GDP，這就需要編制幸福指數，民眾關心的內容自然就會列入政府的議事日程。第二，評價主體會改變。過去是政府自己評價自己，而幸福感的評價主體是百姓。



好的發展，而以幸福帶動發展，民眾就幸福，這就是科學發展，好的發展。

香港商報：用幸福最大化來啟動改革，能替代政治改革嗎？

徐景安：以民眾幸福為目標，就會改變政府行為。首先，改變了評價目標，以民眾幸福代替GDP，這就需要編制幸福指數，民眾關心的收入、就業、環境、住房、醫療、教育以及情感和精神層面等內容自然就會列入政府的議事日程。第二，評價主體會改變。過去是政府自己評價自己，而幸福感的評價主體是百姓。

江蘇省江陰市於2006年提出了建設「幸福江陰」，提出「人人都有好工作，人人

都有好收入，人人都有好環境，人人都有好心情，人人都有好身體」，並以此提出了一套評價指標體系。江陰市委書記米民陽說：「幸福不幸福，老百姓說了算。」

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推進民主化進程，使政府決策反映民意，並接受民眾監督。民主有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執政的理念與決策直接來自民意，並由民眾來評價，這也是民主建設。也可根據民眾意願逐步推進選舉民主。

香港商報：這完全取決於政府意願，不願意怎麼辦？

徐景安：目前是啟動改革階段，當然取決於政府的意願。當年，推動股份制，搞上市，也是有的願意，有的不願意。當試點成功，逐步推廣，那就不一樣了。不願意，就下台。

從提高民眾幸福入手推進改革，積極而穩妥，直奔主題，抓住了綱，綱舉目張，關係民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就成為制定政策、改革制度的出發點。

儘管現在江陰走在前面，汕頭也提出了「幸福汕頭」的口號。但是應該說，深圳才是最具有條件為中國新改革高舉幸福大旗的地方。

香港商報：深圳曾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功勳城市」，您怎麼看待深圳的改革和創新精神的弱化？

徐景安：當年深圳的改革創新，是逼出來的，不改革就活不下去。要開發沒有錢，不得不冒險，進行土地制度改革。而今天的深圳，財大氣粗，每年財政收入800多億元，沒有了改革的動力與壓力。改革背景也不同，當時由中央明確授權，鄧小平為改革保駕護航。現在，整個中國對於改革缺乏共識，身居要位的官員不敢冒然行動，使命感與責任感今非昔比。

深港合作能否走向深水區？

香港商報：過去30年，深圳經濟的騰飛離不開香港因素；深圳的理念創新、制度創新很多借鑒於香港。這幾年，深圳官方提出的河套、前海等一系列建設方案也都表現出一種希望同香港走得更近、合作更深入的意願。您怎麼看待新時期的深港合作？

徐景安：深圳與香港保持更密切的經濟合作關係，符合這兩個城市共同

的利益訴求。香港在執政理念、社會政策的制定方面仍有很多值得深圳學習和借鑒的地方，例如香港的廉政制度、公屋制度、法制化建設等都值得深圳學習。但照搬香港模式並不能解決深圳和內地面臨的問題，不能代替深圳自身的創新。核心理念的改變，只能靠深圳、靠中國內地自己探尋。

香港商報：前海是近兩年深圳大熱

的話題，深圳市政府對前海區域與香港合作進行體制創新有著很高的期待，您怎麼看待前海的前景？

徐景安：我對前海的建設沒有研究。前海發展得好，建設得很漂亮，無非為深圳名片增加了新的亮點，與增加深圳市民的幸福感與滿意度關係不大。政府應該主動尋找更多能與市民產生共鳴的改革切入點。

徐景安

1941年生於上海。1964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曾在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家計委、國家體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1987年調任深圳體改委主任。深圳證券交易所第一任副董事長。著有《經濟體制改革與發展對策研究論集》、《中國未來與理念革命》等。現為深圳景安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幸福研究院院長，深圳市民情感護理中心主任，創建中國新文化論壇主席。